

朱熹《诗集传》在朝鲜半岛的流传及版本特征

冯伊恬

(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510632; 781085541@qq.com)

摘要: 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典范之作,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文本随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后, 也在朝鲜王朝《诗经》学史的长卷上书写了重要的篇章。结合历史文献, 并以《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的《诗集传》相关版本为主要切入视角, 能够梳理朱《传》在朝鲜半岛的历史流传, 并管窥朝鲜所藏朱《传》的版本特征。

关键词: 朱熹; 《诗集传》; 传播; 版本

引言

朱熹是南宋著名学者, 一生勤于治学, 著述宏富。作为其诗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诗集传》在文学、训诂、音韵、理学教化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是《诗经》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诗集传》的研究已呈现多维度、宽视野的态势, 研究成果蔚然可观。然而, 相较于其他研究面向, 关于《诗集传》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尤其是在朝鲜半岛的流布方面关注总体较少, 对朝鲜半岛保存下来的《诗集传》的版本情况尚有一定的考察空间。

《诗集传》作为《诗经》宋学的权威代表, 随朱子学东渐至朝鲜半岛后, 在该地区的《诗经》学史上占据了无可替代的地位, 学者们长期浸淫于对《诗集传》的尊崇与诠释中。因此, 通过追溯《诗集传》在朝鲜半岛的历史流传, 梳理现存于韩国的《诗集传》及其相关著述的版本情况, 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朱熹《诗经》学在异域的传播与影响, 同时也能为全面评估朱熹学术思想在东亚文化圈中的地位与贡献提供更多信息。

1. 《诗集传》初传高丽

南宋末年, 《诗集传》文本就可能已流传至朝鲜半岛。时北方蒙元南侵, 朱熹曾孙朱潜曾携家眷门人东渡高丽避乱:

宁宗嘉定十七年甲申春, 袖家谱携二男一女, 与门人叶公济、赵昶、陈祖舜、周世显、刘应奎、杜行秀、陶成河七学士浮海而东……舟泊锦城, 乃家焉……至理宗淳佑三年癸卯, 蒙主闻宋朝臣民多出东国, 使高丽一一押送上都, 于是大索诸道。时公亦在索中, 乃变名积德, 子余变名余庆, 而亡隐于绫城之考亭。时高宗三十年癸卯, 王上表请兑追索, 蒙主不许, 往复再三然后许之, 公遂讳来处, 自处以东人, 而又“三别抄”侵掠于海浦, 移入龙潭朱茁川之上新安村, 躬耕读书, 接物宽仁, 土民感而化之, 号其里曰仁夫里, 或曰君子里, 谓朱茁川曰朱子川, 又蒙兵侵掠于完山……复隐于绫城之竹树夫里, 及其卒, 葬于锦城之南洛阳山下[1]。

不管是出于家族文化的传承还是自身修己立言的需要, 朱潜及其门人在东渡时都会携带部分朱熹的著作, 《诗集传》或许就在其中。又因当时“蒙元的铁骑不但践踏了江南, 而且也蹂躏了朝鲜半岛。以至于避乱半岛的朱潜也不得不隐姓埋名, 四处躲藏。”[2]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诗集传》文本出现在朝鲜半岛, 也至多以私人讲学的形式在民间、家族间代际传承, 无法进一步拓开传播与影响。

而有史可证的首次将朱熹著作引入朝鲜半岛的是高丽末大儒安珣(字士蕴, 号晦轩, 1243-1306)。《晦轩先生实纪·年谱》“十六年”条曰: “庚寅(1290), 先生四十八岁。留燕京, 手抄朱子书, 摹写孔子朱子真像。时朱子书未及盛行于世, 先生始得见之, 心自笃好, 知为孔门正脉, 收录其书, 摹写孔朱真像而归, 自是讲究朱书, 深致博约之功。”[3]此外, 学者洪奭周在重刊序中也写道: “晦轩文成公之生, 去朱夫子仅四十余岁。方是时, 女真、蒙古交兵于中国, 丽氏之梯航不及于浙闽之间者百年。自王宫以下, 家家奉浮屠

氏梵呗之声多于弦诵，学士大夫号为博极载籍者，亦未尝识朱子为何如人也。自文成公一入燕都，始手钞其书以归，又购其图像，与孔氏俱奉于座右。又为文告太学诸生，使之一遵朱氏。然后，朱氏之学始稍稍行于东方。至今谈经传者，非朱子之书不敢治，虽俗衰教弛，大儒不作，异端邪波之说犹不敢公行而无忌。”[3]充分肯定了安珣在朱子学的传播中作出的历史贡献。

然而，关于安珣在元大都所抄录的“新刊朱子书”的具体内容，史料中均语焉不详。韩国学者崔英辰在《高丽末期韩国对朱子学的吸收》中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了武人乱之后高丽和中国的思想界动向，其中也只言“安珣立元朝后，携朱子书与孔子、朱子真像转写归国[4]”，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韩国学者接触到的相关材料中并未明确安珣携带回国的朱子书的内容。至于部分作品中提及安珣手抄或购买《朱子大全集》、《朱子全书》等说法，应是误将典籍中的“朱子书”与《朱子全书》等同所致。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知，《御纂朱子全书》乃康熙五十二年（1713）圣祖仁皇帝御定，而《朱子大全集》这一名目则见于康熙戊辰年（1688）蔡方炳、臧眉锡所刊《晦庵集》，“方炳书后，题曰《朱子大全集》，不知其名之所始。”[5]至于安珣缘何手录而非直接购置书籍，或是“由于其时为元朝立朝之初，大都的图书刊刻刚刚起步，南方浙闽所刊图书的流通因地域之限，在大都往往脱销[6]”，或是出于个人偏好，在抄写过程中能进行主观筛选，杂录所需各类内容。安珣于忠烈王十五年（1289）“闰十月壬子，从王如元”，“十六年三月丁未，从王还自元”[3]，即留元时间约半年，手抄内容必然存在局限性，无法断言《诗集传》的相关文本是否在其所录之列。

忠烈王二十九年（1303），安珣又“送博士金文鼎于江南奉先圣及七十子像购祭器、乐器、六经、诸子史、朱子新书以来。先生忧东方经籍不备，闻江南犹存宋室礼物，又多朱子新书，特送博士等于江南广购，五月还。”[3]其时，自蒙古太宗八年（1236）将朱熹在内的六君子配祭元都燕京周子祠中，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将理学定为南宋官方统治思想，朱熹思想的影响已历经半个多世纪沉淀与扩散。尽管元朝官方直至皇庆二年（1312）始颁诏规定科举考试“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7]但任何社会思想或学术潮流的官方认可往往要建立在长期而缓慢的社会实践与学术积累之上。因而可合理推测，在1303年这一时段，朱熹的《诗》学阐释已在学界士人团体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任前往江南购书的金文鼎带回的朱子新书中很可能有《诗集传》在内。

元延祐元年（1314），元仁宗又赐予高丽忠肃王“书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册，共计一万七千卷，皆宋秘阁所藏[8]”。《宋史·艺文志》是记载宋代官家藏书名目的史志总书目，其中中存目“朱熹《诗集传》二十卷，《诗序辨》一卷[9]”，说明《诗集传》在宋代已进入官方秘阁藏书中，那么元仁宗所赐宋秘阁万卷书中也当包括《诗集传》。

综上观之，在元朝与高丽朝书籍交流互通的过程中，《诗集传》已存在初传朝鲜半岛的可能性。

2. 《诗集传》在朝鲜王朝的传播

《诗集传》最初是作为朱子学的一部分而传入高丽，真正在朝鲜半岛的各阶层传播并产生重要影响则是朝鲜王朝时期，这与当时的传播语境密切相关。其一是朱子学的升格。高丽时期，官方认可和社会上流行的《诗经》的注疏本仍是唐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李朝建立后，受元明官学的影响，且吸取高丽末年佛学乱政的教训，定朱子学为官学，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传注在朝鲜官方经学教育体系的占据了核心位置，《诗集传》也随之被奉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并借助科举的力量迅速影响全国，朱子《诗》学得以在李朝士人中广泛传播。其二是谚文的创制与使用，为《诗集传》的传播新增了一大媒介。由于佛教在朝鲜朝前期的社会各阶层中仍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统治者有必要打破语言文字方面的隔阂，向不识字的中下层阶级普及儒家思想，“训民正音”应时而作，推动了朝鲜用本民族文字翻译中国著述的进程，也促进了《诗集传》在各阶层中的传播。其三是印刷技术的发展与革新，活字印刷术13世纪传入朝鲜，而后朝鲜在此基础上开始使用泥活字、木活字印书，并于14世纪创造性地发明了铜活字印书，还创造了铅活字、铁活字等。印刷文化的日益繁荣为各类典籍的刊行出版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

从相关历史来看，朱《传》主要通过官方与私人的两种书籍交流途径传播至朝鲜王朝。首先是官方层面的传播，即朝鲜向中国奏请赐书、遣使臣购书以及中国帝王向朝鲜赐书。其中往往有《朱子全书》、《五经大全》等涵盖了《诗集传》在内的大书，《诗集传》便作为这类浩繁卷帙中的一部分实现了东传。如1403年（朝鲜太宗三年，明永乐元年），帝赐《朱子全书》；1419年（朝鲜世宗元年，明永乐十七年），帝应使臣奏请，赐御制序新修《五经四书大全》；1426年（朝鲜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又应奏请而赐《五经四书大全》；1451年（朝鲜文宗元年，明景泰二年），文宗王令出使明朝的使团在中国购买《朱文公集》等书；1469年（朝鲜睿宗元年，明成化五年），明帝赐《五经大全》。1518年（朝鲜中宗十三年，明正德十三年），“由金安国在北京购入的天顺本”[10]《朱子大全》被引入朝鲜半岛。又如1728年（英祖四年，雍正六年），清雍正帝赐朝鲜冬至使内府书籍四种，其中的《诗经传说汇纂》与《诗集传》关系密切，虽意在指摘《诗集传》之失而抑抵其地位，体例上还是以朱《传》列于各家解说之首，也可视作朱《传》传播历程中的一种形式。单行本的《诗集传》同样在朝鲜半岛流传，如朝鲜王朝曾刊印《诗传》后进献明廷，1575年

（朝鲜宣祖八年，明万历三年）：“上问于校书馆：‘《资治通鉴》印出事何如？四书五经印出进上件，今几何？’馆对曰：‘四书五经进上二十件内，《大学》、《春秋》、《礼记》已毕印，《论语》、《诗传》今方印出，他书则刊张甚多，时方督刻矣。’”[11]161又如1604年（朝鲜宣祖三十七年，明万历三十二年）成均馆牒呈于礼曹：“自祖宗朝，置尊经阁于泮中，多藏书籍，为士子藏修之所，甚盛意也。变后，书籍荡然无存，他无措备藏置之路。忠清道：《诗传》、《四书》、《家礼》……并皆新刊，自曹行文，各道各二三件，印妆上送，藏于本馆，以为诸生讲阅之资事，入启施行。”[11]其次是私人传播，具体表现为中国士大夫向朝鲜使臣赠书，属于文人学者之间的友好交往。据《燕行录》记载，1534年（朝鲜中宗二十九年，明嘉靖十三年），礼部郎中曾存仁曾“以公、穀两《春秋》及朱子《诗集》见遗。”[12]此“朱子诗集”具体指向当非《诗集传》^①，但这段材料至少能够佐证在当时的私人交往中，大臣与使者们会以各种书籍作为交换，既然《春秋》之公羊、穀梁二传在交换之列，《诗集传》作为有元以来的官方通行注本，未尝不会在可见记载之外的人情往来、文化交流中传播至朝鲜半岛。

《诗集传》得以在朝鲜王朝在学术界保持长久的生命力，离不开朝鲜本土学者的研究与阐释。比如丽末鲜初的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他是最早采用汉文阐释朱熹《诗集传》的学者，开启了诠释朱熹《诗集传》之风潮，所著《五经浅见录》中的《诗浅见录》，秉持对《诗集传》绝对信任的态度，忠实地接受了《诗集传》的解释。而得益于世宗朝“训民正音”的创立，李滉（字景浩，号退溪，1501-1570）最早开始用朝鲜本土文字解《诗》，他的《诗释义》“不仅用朝鲜语、汉语音标注朱熹的音注和大全本的音注，而且遵循了朱熹《诗集传》的注释，是最早用本国语阐释朱熹《诗集传》的译本。”[13]宣祖在位时期，对儒家经典进行了译制，出现了《诗经》的谚文全译本，为其在民间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自然也推进了朱子《诗集传》在中下层社会普及。此后还有丁若鏞、尹鑰、朴世堂、成应海等诸多学者在朱子《诗》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扬弃，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朱《传》注入了新的学术活力。

3. 经筵活动中朝鲜君臣对《诗集传》的受容

经筵起源于我国汉唐时期，是一种讲经论史的御前讲习活动。此制度传入朝鲜半岛后，推动了儒学典籍的传播。《诗集传》正是经筵活动中所使用的重要书籍之一，以《朝鲜王朝实录》为主要观照，其中记载了诸多君主御经筵、君臣共讲《诗集传》的记录，且皆以“诗传”为名，记录内容最为详细丰富的当属《孝宗实录》。

朝鲜王朝君臣对《诗传》的阐释体现了朱熹《诗》学思想在朝鲜上层的受容情况，总体上反映出以下特征：

其一，经筵有朝、昼、夕讲，此外时复夜对，《诗传》则主要在昼讲时习读，朝讲次之，夕讲再次之。每次进讲的篇数不固定，而篇幅较长的诗往往分多次讲解，如《孝宗实录》中，《七月》八章，章十一句，分作4次讲；《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分作3次讲；《六月》六章，章八句，分作2次讲；《车攻》八章，章四句，分作2次讲。若逢居丧，则会更换进讲书籍：“王尝讲《诗传》，而至是停《诗》讲《书》，以宅忧也。”[11]

其二，朝鲜王朝君臣对《诗经》的理解大致尊朱，但并不完全循蹈朱子集注，也有相悖处。如《孝宗实录》八年（1657）春正月二十二日条：“上御昼讲，讲《诗传》《蓼莪》章。上曰：‘诗本性情，故能令人感发惩创，而至于《蓼莪》，尤令人感动处也。国有羞耻，而含忍度日，将何颜面立于斯世乎？’读《诗》至此，不觉呜咽。”[11]朱子以为“人民劳苦，孝子不得终养，而作此诗。”[14]朱子更多地是站在“诗人”本位，从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的角度阐发诗歌的创作背景和动机，体现了对儒家思想中的仁、孝等观念的重视。孝宗则更多从统治者的立场，侧重将诗旨与国家的兴衰荣辱、君臣士人的责任感联系起来，从而强调面对国家困境时应采取行动，政治教化意味更显浓厚。

其三，经筵中的经史研读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被详细记录下的《诗传》讲习片段中，君臣之间的问答探讨不仅围绕《诗经》文义，更注重结合史事、时事进行延展，并着落于当下的国家治理和政治教化。比如联系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形象事迹、政治故事，以史为鉴，达到警醒君主、教化臣子的目的。《诗传》中蕴涵的“诗教”思想正契合了朝鲜王朝统治的需要，也正因如此，诗歌文学、审美层面的诠释在经筵《诗传》诠释体系中彻底边缘化。宋时烈曾向统治者提议：“《风》则别无深奥之意，而《雅》、《颂》则多有监戒处，愿留意。”[11]可见涉及历史、道德、政治等方面的警戒和教诲意义才是统治阶级所推重的。

4. 韩国所藏朱熹《诗集传》的版本考察

由韩国延世大学全寅初教授主编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汇总了韩国各大图书馆的现存汉籍目录，收录范围包括刊刻于中国而流传于韩国的中国典籍、刊刻于韩国的

中国典籍以及中国典籍的韩国注本，是观照《诗集传》在韩国的流传与保存情况的重要文献资料。其中经部“诗”类共有435条目，除去信息不详的条目，在信息较为完整明确的著录中，数量较多的如表1所示：

表1 《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诗”类所存高频书目

作者	书名	条目频次
朱熹（宋）集注，胡广（明）等奉敕纂修	《诗传大全》	191
朱熹（宋）集传	《诗经》	23
郑玄（汉）笺，孔颖达（唐）疏	《毛诗注疏》	16
王鸿绪（清）等奉敕纂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	13
朱熹（宋）集注	《诗传》	12
朱熹（宋）集传	《诗传大文》	10
朱熹（宋）集传	《监本诗经》	8
朱熹（宋）集传	《诗》、《诗经正文》、《诗传正文》	3
郑玄（汉）笺，孔颖达（唐）疏，卢宣旬（清）校正	《附释音义毛诗注疏》	3

可见韩国历来存录的诗类文献中，朱熹及其著作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诗传大全》的数量之盛，尤为显著。此书为明永乐朝官修《四书五经大全》中关于《诗经》的一部，是明代官学定本以及科考的标准参考书目之一。据凡例所言，此书以朱熹《诗集传》为宗，以刘瑾《诗传通释》为底本，稍加损益，删去诸家诗说中与朱《传》矛盾之处，并将朱子《语类》《文集》中与《诗经》有关的言论以及诸家诗说堪为朱《传》补充者添入。这191条目《诗传大全》包含的版本众多，已知具体刊刻年份的有朝鲜王朝宣祖三十九年（1606）、正祖十七年（1793）、正祖十八年（1794）、纯祖八年（1808）、纯祖二十年（1820）、纯祖二十八年（1828）、哲宗九年（1858）、高宗七年（1870）等。作为与《诗集传》密切相关的典籍，《诗传大全》自传入后得到了反复再版、多次刊印，始终是朝鲜半岛的主流出版物，对朱子《诗经》学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再选取部分信息较完整朱《传》相关条目，按照刊行时间排序，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朱熹《诗集传》相关条目信息概览

书名	版本类型	刊行地及刊行年度	册数及卷数
诗	木版本	正统十二年（1447）	20卷6册
步元诗经	木版本	明朝后期	6卷4册
诗传大文	甲寅字体训练都监字版本	光海君~仁祖年间	1卷1册（卷2缺）
诗经正文	写本	朝鲜后期	1册
监本诗经	木版本	文会堂 乾隆四十九年（1784）	8卷4册
诗传	芸阁印书体字本	英祖年间	20卷4册
诗传	木版本	金陵文盛堂 嘉庆十五年（1810）	8卷4册
诗经	木版本	金阊书业堂 嘉庆二十年（1815）	8卷4册
诗经	石印本	同治十年（1871）	5卷4册
诗经集传	木版本	金陵书局 光绪七年（1881）	8卷5册
监本诗经	木版本	光绪十七年（1891）	8卷4册
诗经	石印本	上海天宝书局 民国七年（1918）	8卷4册
监本诗经	石印本	京都文成堂 民国十年（1921）	3卷4册
监本诗经	石印本	上海尚古山房 民国十八年（1929）	8卷4册
诗经	石印本	上海扫叶山房 民国二十六年（1937）	8卷4册

这些以朱熹集传为主要内容的诠释《诗经》的典籍名称各异,可见随着刊刻次数的增多,不同版本的问世,《诗集传》的异称也相应增加。从明正统十二年(1447)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在近五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不同出版机构都对朱子集注本《诗经》进行了印刷刊行,并且这些书籍最终都在朝鲜半岛留存至今,一方面是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朱《传》在朝鲜王朝的影响力之稳固绵延,即使在朝鲜朝中后期朱《传》开始受到质疑,“尊朱学派依然受到王权的强力支持,并在诗经学界占绝对优势,因为朱熹诗说仍然有助于维护政治统治和道德教化。”[13]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朝鲜肃宗四十五年),使臣赵荣福“夕到凤凰城,寄宿于商贾夏姓人家。……有一姓明少年,自称秀才,能通经书云,故余出行囊中《诗传》一册,使读之,则读一章,又令读注,则不肯,仍曰愿得此册。余曰:‘此是吾爱玩之册,不可许也。’”[15]燕行途中依旧携带《诗传》,其珍存研读若此,《诗集传》直至朝鲜王朝末所受到士人之重视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朱《传》类作品的诸多版本之中,写本相对较少,如内容仅一册的写本《诗经正文》应当是按需求对朱《传》内容进行删减,私人抄录用以教学或研究,可视作精简本的《诗集传》。而以石印为主的文本占据了较大部分,这是由于西方石印技术在晚清及近代传入中国后,以其印制快、质量高、价格低的特点而逐渐占据了出版中的主流地位。再者,韩藏朱熹集传之作以8卷本为多。据学者考证,《诗集传》完稿于淳熙十三年(1186),经朱熹及其弟子的反复校勘修订,曾多次改版刻印,随着朱子学的不断发展,《诗集传》在历朝历代一再传刻,文本面貌也发生了各种变化:最初为二十卷本,元代出现了卷帙合并后的十卷本,明嘉靖年间又出现了据二十卷本删改而成的八卷本,内容已有大幅变动。八卷本几乎取代了原来的二十卷本而成为晚明及清代普遍使用的文本,对后世影响很大。且如前所述,《诗传大全》的颁行定尊必然影响其后刊印的版本选择,导致其他版本系统的《诗集传》刊行数量的减少。而现存于韩国的朱《传》也是以8卷4册本为主,与中国明清时期的通行版本情况基本保持了一致。较为特殊的是“甲寅字体训练都监字版本”的《诗传大文》,“甲寅字”代表着朝鲜朝金属活字印刷术的最高水平,自创立至朝鲜末期一直是官铸活字所用,而“训练都监字”是木活字的一种字模,这版《诗传大文》当是以新铸铜铸字“甲寅字”刊行本为底本进行翻刻,改原字体为“训练都监字”,可见印刷术的革新丰富了《诗集传》的传播形态,进一步展现出朱《传》文本进入朝鲜半岛后版本的多元性。

除表格中的信息明确的著述外,收录于韩国的还有其他中韩两国学人撰写的朱《传》相关衍生作,也具有多样性。如10卷4册的写本《诗传讲经》、2册的写本《诗传讲谱》以及4卷4册的写本《诗传讲义》,虽作者不详,但由书名可知其体例,当是对《诗传》按需进行删减后应用于私学或官学中教学实践的本子。又如元许谦所作8卷4册的《诗集传名物钞》、明梁寅《诗演义》这类推衍、绍述朱《传》的学术著述,前者是对《诗集传》中名物考证和解释进行增补之作,后者亦重在发明宋学,尊朱崇传。而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对朱说多有反驳,元朱倬《诗经疑问》编纂体例较为独特,在绍述朱子之说外,也采用问答方式对《诗经》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质疑朱《传》并有所新见。可见朝鲜半岛所受容的《诗》类作品中,虽以宗朱之说为主流,也不乏新声异说。

5. 结语

高丽末,朱子学经由元朝传至朝鲜半岛。作为朱子学的一部分以及中华文化的载体,《诗集传》文本也在此过程中传至东邻,并在李氏朝鲜时期成为官方学术,以权近、李滉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在《诗集传》的诠释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韩国现存的诗类文献中,朱熹的《诗集传》文本数量甚夥,尤其是官方屡次重刊并颁行的《诗传大全》,其显著地位彰明了朝鲜官方对《诗集传》正统性的高度认可。此外,还存在众多版本不一的朱《传》相关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书名异称颇多,且包含非明清时期国内流行的八卷本形式,体现了其所存版本的多元性。同时,部分基于《诗集传》的学术衍生之作亦流传至朝鲜半岛并得以保存,这些著述体例不一,在绍述朱子学说之外颇有新见。

这些保存于海外的《诗集传》文本是《诗经》宋学影响域外的历史证明,也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与融汇的生动写照,为国内《诗集传》版本研究提供了对照、补充的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注释

① 据《中宗实录》二十九年(1534)四月二十四日条:上御思政殿,引见进贺使苏世让。……世让曰:“……越翌日,乃三月初十日也。臣等往礼部告辞,郎中曾存仁曰:‘尚书因提督之言,闻宰相好作诗,欲见之,幸勿惮相示。’臣强辞不示。序班曰:‘不在多,虽二三首,不可不示。’臣不得已以律诗二首,书送于郎中,郎中即赍进于尚书。尚书方寝,未即见之,臣等退还于馆。未几,尚书使书吏送所着诗三封于臣曰:‘今

见宰相所制，诗律甚好。吾所着，亦可见也。若如他使，则不可许也。早知如此，则待之宜厚，不可以凡例，待之也。’其间褒辞甚多矣。曾郎中亦送《春秋》《公羊》《谷梁传》、《朱子诗集》。……”见《中宗实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辑：《李朝实录》第十九册卷七十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339页。又《中宗实录》三十七年（1542）五月一日条：传曰：“近来凡印出书册，多有颁赐，而独不及世子。圣经贤传外，不可见杂书而如是乎？近来印出之册，如诗集可见者，则印入东宫何如？”政院回曰：“诗集，不关于人君之学问，如魏郑公谏录，则关于治道。四书五经讲习余暇览之，则可以辅益君德。”《实录》中的“诗集”并无指代《诗集传》的用法，且结合上下文语境涉及“作诗”这一行为，“诗集”当指朱子所作之诗。见《中宗实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辑：《李朝实录》第二十册卷九十八，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416页。

参考文献

- [1] 新安朱氏世谱所编.新安朱氏世谱总卷 [M].韩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 [2] 刘刚.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研究(1290—1409) [D].暨南大学, 2012: 25.
- [3] 安珣.晦轩先生实纪 [M]//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35册卷一至卷五).首尔: 景仁文化社, 1973.
- [4] 吴震.东亚朱子学新探 [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546.
- [5] (清)永瑢,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M].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委会, 整理.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9: 823.
- [6] 方彦寿.朱子与朱门后学论丛 [M].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22: 400.
- [7] (明)宋濂.元史(卷八十一) [M].中华书局编辑部, 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019.
- [8] (朝鲜李朝)郑麟趾.高丽史 [M].孙晓, 主编.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090-1091.
- [9]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二) [M].中华书局编辑部, 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5046.
- [10] 陈国代.文献家朱熹: 朱熹著书活动及其著作版本考察 [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37.
- [11]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辑.李朝实录 [M].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 [12] 苏世让.阳谷赴京日记 [M]//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一辑第三册).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87.
- [13] 付春明.朱熹《诗集传》在朝鲜朝诗经学史上的接受与影响 [J].国际汉学, 2020(1): 110.
- [14] (宋)朱熹.诗集传 [M].赵长征, 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92-193.
- [15] 赵荣福.燕行录 [M]//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三十六).韩国: 东国大学校出版部, 2001: 206-208.